

# 海外华人学者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

吴前进

〔内容摘要〕 21世纪以来,有关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的论题日渐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沟通的一个重要内容。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的提升,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评价并非一面倒的赞词或驳辞,而是夹杂着褒扬、赞同、疑虑、不满、恐惧、诋毁乃至捧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如何向世界说明自身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不仅需要本国政府人士和各阶层民众的政治智慧和沟通技巧,更需要一大批身居海外、熟悉和了解当地社会和文化的学界人士,在国际语境中向世界阐明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以及中国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本文以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为视角,探讨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海外华人学者在国际舆论界、学界涉华议题中的话语内容、作用及其局限。

〔关键词〕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华人学者 话语影响

〔作者简介〕 吴前进,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 一、华人学者实施话语影响的主体、内容和方式

“话语权”即说话权,控制舆论的权力。在当代社会思潮中,话语权指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它是行为主体具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right)以及使自己意见得到认可的实力(power)。<sup>①</sup>从国际政治学角度来看,国际话语权指的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就国家事务和相关国际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是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的综合运用。<sup>②</sup>它虽然体现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和传媒各个领域,但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国际政治权力关系,其主体是各种国际行为体,尤其是民族主权国家。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归根到底乃国家实力和国家利益的博弈。<sup>③</sup>

① 唐润华《新形势下如何提升国际舆论话语权》,《中国记者》2011年10月9日。

② 张志洲《话语质量: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红旗文稿》2010年7月27日。

③ 徐大超《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及其“硬权力”基础》,http://www. ddsjcn. com/10 - 06/10 - 06 - 23. htm。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力量的崛起和中国综合实力国际排位的上升,中国影响世界的能力在总体上增强了,话语权的份量有显著提升。但与此相伴的是,中国在全球话语中表现出的弱势也相当明显,中国常成为全球媒体批评的对象。在国际交流和国际事务中,“中国缺乏自己的国际意见领袖、国际知名专栏作家、国际知名记者队伍”来阐述中国的主张。客观地说,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仍面临西方国际话语权的强势压力而不得不显示出抗压性和自主性。因此,对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说明中国发展道路的正当性,回应外部世界的质疑和挑战,保障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合理权益,就需要加强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意识和能力。<sup>①</sup>海外华侨华人作为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桥梁和纽带,在中外关系进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华侨华人在维护和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方面功不可没。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日渐通过传统媒体(报纸、杂志、图书、学校讲台、研讨会、论坛、电台、电视台)和新媒体(互联网、手机网络)平台,向西方政府和民众阐释有关中国的历史、现实和发展,并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旨归,努力向世界说明中国。

这一批能够在国际舆论界、学界形成话语影响的华人学者队伍大抵包括三个层面:一是20世纪50~60年代赴海外的台港移民,主要集中在美国,有当今著名的政治学人和文化学者;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赴海外的华人移民,也主要集中在美国,以政治学者和文化学者为主;三是20世纪70年代后成名于当地和国际学界的华人后裔,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政治学者、历史学者和文化学者为主。上述三股力量在不同面向上发挥着舆论引导和住在国政府智囊的角色作用。他们的存在和发声极大地有助于住在国决策层对于中国政策的考量和中国文化的认知,极大地有助于中国决策层的兼听则明和对外部认知。这一批华人学者属于具有双文化或多文化背景的第三方力量,虽然他们的政治身份和认同立足在住在国,但他们的文化身份和集体意识与中国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隔断。这种住在地身份和全球身份的融合,决定了他们职责和关怀的多视域。当然,除上述三股华人学者精英力量之外,还有一大批新华侨华人,他们开展的各类事关中国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声援、签名等活动,对各住在国政府决策层和社会各个阶层认识和了解中国政治和文化也具有相当的助益。他们共同构筑了华人社会精英群体的话语权议程和行动模式。

---

<sup>①</sup> 张志洲《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困局与出路》,《绿叶》2009年8月18日。

### 1. 华人学者实施话语影响的主体: 住在国政府和民众

华人的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身份决定了他们比住在国政府和人民更了解中国, 更有权利评述中国。这种文化隐喻决定了他们能够在不同场合, 以不同身份来阐述他们的中国观。换言之, 华人学者作为话语施行者或传播者, 在住在国以西方话语体系阐述中国, 提供住在国政府和民众认识中国的“第三只眼”。一些美国华人学者时在关键事件和敏感问题上, 为中国立场、观点作出尽可能的事实分析和舆论引导。例如, 针对外界质疑中国政治改革问题, 熊玠<sup>①</sup>发表了《邓小平与我谈政治改革》(2012年7月19日); 针对“中国威胁论”, 发表了《中国崛起何以是和平的》(2012年11月24日); 针对中日钓鱼岛争端, 发表了《国际岛争中的说理致胜之道——钓鱼岛问题的历史与国际法透视》(2014年8月1日) 等等。同样, 就当前较为活跃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sup>②</sup>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sup>③</sup>而言, 他们在一系列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方面时有著述、分析和评论, 为住在国政府和民众以及国际上所有关心和关注类似问题的读者提供了住在地华人的独特思考和观点。正由于他们独到的分析和评论, 为他们自己在学界和智库的地位影响中获得了相应的话语权。另外, 就当代著名的儒学大师杜维明<sup>④</sup>而言, 他曾在哈佛大学开设儒学课程, 用英语向西方和非西方的年轻人传授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和社会理想, 且频繁游走于东西方之间, 他把“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的儒学思想与全球听众进行广泛交流, 其心心念念的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交汇, 打通各自文化的封闭性, 立意把东亚的地方知识转化为全球接纳的共同价值。这些华人学者把在住在国、西方世界乃至全球各地积极传播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他们的话语对象, 除了住在国政府和民众之外, 更具有了全球的受众和话语平台。

### 2. 华人学者的立场观点或话语内容: 与住在国政府相关

就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来说, 话语权往往是由一个主权国家的实力及其在处理

① 熊玠, 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 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国际政治、亚太国家关系, 主要著作有 *Anarchy and Order: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Law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hina and Japan at Odds*、《中国第二次再起》、*Sino-Japanese Disputes and U. S. Involvement* 等。

②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政治、国际关系与社会问题专家。2004年始, 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代表作品有《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和新世界秩序》等。

③ 李成,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研究领域聚焦于中国领导人的转型、代际更迭和技术发展。

④ 杜维明, 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 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2010年12月被聘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and 所拥有的国际影响所决定的。与此相关,话语内容所反映的也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立场和主张。尽管大多数华人学者的话语内容综合了中国和住在国的看法,以较为公允和独立的视角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述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根本立场不能脱离住在国政府和人民所持有的立场和观点,他们的言论往往必须反映与住在国相关的利益和国际责任。如前所述,李成这位在美研究中国问题的核心人物,其领衔的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团队成员中就包括美国最顶级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如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卜睿哲(Richard Bush)、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杜大伟(David Dollar)等。也因此,李成的观点不可能与他的团队成员的主要观点完全相背离。正由于李成在美国智库中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时常会出现在国会与中国有关的各类听证会上,<sup>①</sup>他的言论代表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近年来,李成除了深入研究中国领导人,建立有关中国精英阶层的数据库之外,也是英语世界最早研究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学者。他深入分析中国政治和社会,一方面固然是为全球背景的关注中国问题的读者提供思考;另一方面则是服务于美国的政府决策机构。当然,在此过程中,他也致力于中美高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发挥独特的建设性的影响和作用。他被公认为世界上研究中国领导层的顶尖专家。

另外一位具有相同政治影响的是美国华人政治学者熊玠,他曾在1979年美台断交后,深度参与《与台湾关系法》的起草工作。美国订定《与台湾关系法》主旨是“本法为协助维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与稳定,并授权继续维持美国人民与在台湾人民间之商业、文化及其他关系,以促进美国外交政策,并为其他目的。”当年这部《与台湾关系法》起草目的在于取代遭废除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2015年,熊玠通过媒体披露了36年前这部充满争议法律的起草背景和过程,希望向外界澄清误会,讲出真相。所谓真相之一,他至今心有顾忌的是“北京方面会疑虑甚至气愤,为什么美籍华人要争取对台军售?”熊玠解释说“这些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美国人后来加进去的。”<sup>②</sup>显然,海外的“中国通”虽然代表和反映的是住在国的政治利益,但他们十分顾及中国的感受,哪怕尘封多年之后,他们仍希望借助合适时机说出真相,以消除中国大陆的疑虑。

### 3. 华人精英话语平台的全方位性: 架起两个世界的桥梁

<sup>①</sup> 丁源远《布鲁金斯学会:思想的力量》,《21世纪国际评论》2010年第1辑。

<sup>②</sup> 熊玠《我要说出〈与台湾关系法〉真相》,中评社香港2015年1月14日电。

现代社会中可以使用多种话语平台来凸显国际话语权。这些话语平台主要有：(1) 公众媒介，包括媒体、互联网和出版物，如电视、报纸、杂志、书籍和网络等；(2) 国际会议，包括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等等。过去几年，作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李成，一直是中心“中国思想家”丛书的总编辑。这套丛书旨在把出色的中国思想家介绍给英语读者。丛书已经出版的作品包括经济学家胡鞍钢的《2020 年的中国》、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的《因正义之名：在中国推进法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李成为每一本书撰写了长篇前言，通过编辑丛书和撰写前言，他把中国话语推介给西方学界和公众。同时，他也在促进中美两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方面积极发挥影响。在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上，虽然中美两国学者经常表示悲观，但以评论家身份登上全球媒体的李成对此保持乐观判断。他对中国的乐观基于他多年来的研究判断。与李成一样，在美的大多数华人学者坚信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中美两国关系的良好未来。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常利用到中国访学、讲学的机会，传播西方学者和普通民众在有关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和看法。他们在主动构架起两个世界之间互通的桥梁。例如，成立于 1995 年的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其成员绝大部分是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教学研究的中国旅美学者。协会成立以来，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每年在美国举办以中国改革开放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协会还定期出版会讯和《中国研究学刊》(*American Review of China Studies*)，并在中国出版介绍美国的多套系列丛书和多部学术著作，与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sup>①</sup>可以看到，凭借双重文化的优势，华人学者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多个层面上较为充分地实现了话语施行者的权利。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促进了海外华人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华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又促进了中国因素的扩展和影响。过去 30 多年里，像郑永年、李成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且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已经成为住在国政府机构和大众媒体的“意见领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主要集中在美国，例如，加州克莱蒙特·麦肯

---

<sup>①</sup> 《海外华人学者的人文社会科学观——访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会长李捷理》，[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5fc1970100sjhx.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5fc1970100sjhx.html) 2011 年 5 月 16 日。

纳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裴敏欣<sup>①</sup>、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sup>②</sup>、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sup>③</sup>、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学者杨大力<sup>④</sup>等,类似学者的数量还在持续增加。许多华人学者并不讳言,整个中国学者群体在美国取得的很高成就,有赖于中国的崛起。“没有中国在世界舞台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影响力,就不会有西方世界对中国如此的关注和兴趣,就不会有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中国通’”。<sup>⑤</sup>华人学者成为国际社会有关中国认知的来源构成,成为国际舆论界和学界在涉华议题方面的重要发言人,并在不同场合表达他们对于中国与世界相互关系的基本看法。

## 二、华人学者在舆论界、学界涉华议题中的作用

海外华人是中国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支很重要的力量。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华人学者更是这股力量的中坚。他们活跃于住在国的高等教育、科研机构和相关智库,与各住在国精英阶层有着广泛的接触和直接的交流。他们的知识结构、职业地位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们对住在国政府和民众了解中国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

### 1. 重新认识中国,丰富中国学研究

在中国人出洋留学至今的100多年历史中,华人在美国从事教学工作的人数可以说以过去30多年为最多,其中教授有关中国的课程恐怕也属有史以来最多。一些华人教授也体会到,在大学里,通过体制上的安排,即在学分分布上注意学生知识结构的形成,为学生提供机会去接触在大学课堂以外从未接触过的文化、思维方式和观点立场……毕竟在美国教有关中国的课程,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sup>⑥</sup>但究竟

---

① 裴敏欣,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专长研究中国政治经济、中美关系及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经常在《中国季刊》、《今日中国》、《外交官》、《外交杂志》等期刊发表学术文章,并为许多报刊撰写评论,同时为CNN等媒体提供专业意见。

② 刘亚伟,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曾5次陪同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中国并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研究领域为美国政治史和中美关系。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中英文文章,主编《当代中国农村治理与选举观摩丛书》、《德赛政治论丛》,合著《奥巴马:他将改变美国》,创办《21世纪国际评论》。

③ 赵穗生,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当代中国研究》(英文)期刊创办人、主编,美国亚太安全合作委员会理事会成员,美国美中关系委员会成员,主要从事中国外交、中国政治、中美关系、区域合作等问题研究。

④ 杨大力,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政治学教授,中国政治与治理问题研究专家,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学及中国政治,同时担任《美国政治学评论》、《外交季刊》、《当代中国》等著名政治学期刊的主编。

⑤ 陈伟华《布鲁金斯学会首位华裔主任李成:来自中国,关注中国》,《中国日报(美国版)》2014年2月28日。

⑥ 钟雪萍《一份他者的差事:我在美国教中国》,载王斑、钟雪萍编《美国大学课堂里的中国:旅美学者自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什么代表中国,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谈论中国”,<sup>①</sup>仍然令一些华人教授感到困惑,特别是“眼看中国形象不断被有敌意的海外媒体和不负责任的同胞重新创造和涂抹”的情况下,“中国”和“中国人”就变成一个多重、多层、多元的东西,不一定每一层都可以认同,也不一定所有内容都代表“中国”。<sup>②</sup>一些华人教授由此认识到,在海外生活和教书的经历,也是一个学习在什么意义上去想象中国以及如何做中国人的经历。<sup>③</sup>

“在美国教中国文化会碰到各种偏见,遇到各种困难……但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学者,从学英语或其他人文社科开始,进一步研究教授中国文化历史,不是偶然和随意的。我们不能像多元文化所提倡的那样,超乎任何一个特殊的民族国家平均地、没有太多感情色彩地对待各种文化。因为有民族文化的根,有感情和心理积淀,在教学和研究中不可能不隐含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关怀,不可能放弃感情上的亲近。我们定居在美国,但文化血缘和感情之根一直要面对一个问题:对大洋彼岸的中国文化和发展负什么责任?”<sup>④</sup>这是当今许多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和地区学有所成的华人学者的共同感悟,他们无法像美国学者和在美国长大的学生那样,以一种超脱的态度对待中国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构造、呈现什么中国形象,就是他们每天都要寻思的问题。他们需要认真地把中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以自己研究理解的那样,以自己在中国生活形成记忆中的那样,在课堂上传达,恰如其分地解释中国的历史和发展。然而,确切地解释中国一直是一个难题。<sup>⑤</sup>但他们承认,个体的价值不是建立在隔离和对他的排斥中,而是体现在不断地维系、沟通与他者的相互认可和依赖之中。<sup>⑥</sup>那些在北美获得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学位,而后在北美或东南亚从事中国研究<sup>⑦</sup>(或称中国学)的学者,已经不约而同在各自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对这一跨学科领域的加入,大大丰富了当今世界的中国学研究。

① 孟悦《“中国结”》,载王斑、钟雪萍编《美国大学课堂里的中国:旅美学者自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② 同上,第42页。

③ 同上,第43页。

④ 王斑《全球化、地缘政治与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形象》,载王斑、钟雪萍编《美国大学课堂里的中国:旅美学者自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⑤ 王斑《全球化、地缘政治与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形象》,载王斑、钟雪萍编《美国大学课堂里的中国:旅美学者自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⑥ 王玲珍《剥洋葱:在美国教现代中国性别及女性文学》,载王斑、钟雪萍编《美国大学课堂里的中国:旅美学者自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⑦ 美国的中国研究或称中国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属于地域研究,涵盖文学、文化(电影)、历史、政治、社会学、人类学、戏剧、艺术史、宗教和哲学等一系列传统领域。

## 2. 提升中文学术地位 主动嵌入国际学界

有史以来,“马来西亚在中华文化的传播与扎根方面都做得非常认真、执着与积极,可以说不遗余力”。<sup>①</sup>马来西亚华人学者何启良<sup>②</sup>的这番言语道出了华人在本土维护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马来西亚是中国大陆、台港澳之外具有最为完整的中华文化教育系统的国家。目前,当地约有华文小学1000多所,华文独立中学60多所,以华文为主体的大学学院有3所,以及至少有4所大学有中文系。这些中华文化教育系统培育了许多研究中华文化的人才。为了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同胞能以他们的语言了解中华文化的经典著作,马来西亚华人学者特别把中华文化的四大名著翻译成马来文,以促进多元民族社会的相互了解和融合。<sup>③</sup>在马来西亚,中文系老师可以用华语授课,学生可以用华文撰写硕士和博士论文,大学学报采英文、中文和马来文三语并会,真正体现了中文作为学术交流语言的平等地位。中文(或汉语、华语、华文)有今天的话语地位,除了中国崛起之外,更有华人精英长久以来在本土的付出和坚持!

当然,中文作为以普通话为基础的海内外具有中华民族血统者及其后裔的共同母语,在以英语为强势语言的西方学术世界里并不具有话语地位。但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研究重要性的提升,中文走向国际学术界的时机已经到来。2009年,在著名历史学家、华人研究泰斗王赓武的推动下,《华人研究国际学报》(*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asporic Chinese Studies*)正式创刊,这是一份立足于新加坡且致力于华人研究的中文版世界性刊物。刊物的问世,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影响和中国因素的提升,凸显了中文作为国际性学术语言所应具有的话语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研究作为中国研究和国际移民研究的一部分,中国学者以及全球各地华人学者的声音正在扩大。可以看到,作为世界性语言之一,中文的学术地位是率先在东南亚华人世界得到坚持和推广的。而东南亚华人学者更是身体力行,在多语言的国度中倡导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承认中国和平发展对于当地华人社会的积极意义,并予以积极的回应和支持。

---

<sup>①</sup> 何启良《海外中华文化研究的学术交流——〈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侧记》,华夏经纬网,2014年11月25日。

<sup>②</sup> 何启良,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副校长、教授,研究领域为新马政治、华人研究、中国—东盟关系等,在东南亚主要学术期刊和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新马政治和华人社会的研究论文和时评,主要著述有《面向权威》、《当代大华人政治省思》、《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等。

<sup>③</sup> 何启良《海外中华文化研究的学术交流——〈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侧记》,华夏经纬网,2014年11月25日。



### 3. 推介当今中国,促进中外了解

美国华人人文社会科学教授协会会长李捷理<sup>①</sup>提及,海外华人教授在校园内潜移默化式的言传身教,对于传播中华文化、推动美国社会对当代中国的了解是任何其他力量都不可替代的。它远胜于那些重金聘用的公关公司。不少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华裔教授,在中国发生突发事件接受当地电台和电视台采访时,都会对其中的历史事实加以说明和澄清,或者在课堂上回答学生的疑问,这些都有助于美国年轻一代对中国的全面和正确了解。同样,在日本,“日本华人教授会议”<sup>②</sup>的成员及其他华人学者也在中日关系困难的情况下,不断通过媒体和讲坛,向日本年轻一代讲述中日友好的理想。在日本,学界是联系政界、财界和一般民众的主要思想纽带。学界的主流意见往往能够影响当地政治、社会和外交走向。21世纪以来,日本学界有关中国的研究和评价有较大变化,这主要有赖于华人学者在日本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人数的增多,他们通过著述和在媒体发表意见参与到日本学界和舆论界对华观的形成过程之中。这些华人学者比国内学者更了解对日工作的方式方法,更主动地参与到中日交流的各项活动之中。<sup>③</sup>例如,2007年12月27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访华前特意邀请日本华人教授会议的代表前往官邸,听取并接受他们对中日关系的建议报告。<sup>④</sup>2008年4月28日,在长野奥运圣火传递结束、胡锦涛主席访日前夕,自民党高层以邀请参加“学习会”的名义,听取日本华人教授代表的意见,以有助于中日的交流和沟通。<sup>⑤</sup>

在个人能动作用之外,华人学术协会在推介和展示中国形象方面也功不可没。例如,中国留美经济学会(The Chinese Economic Society, 1985)、中国政治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1986)、美国华人历史学家协会(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7)、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Professors of Social Sciences, 1995)、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1996)、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Chinese Associa-

① 李捷理,美国俄亥俄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终身教授,该校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② “日本华人教授会议”,2003年由在日华人学者发起成立,共有近100名华人教授级学者专家加盟,其中教授级占9成以上,1/3是理工科学者。

③ 朱建荣《日本各阶层是怎样看待中国的?——21世纪的新变化及其趋向》,共识网,2014年12月12日。

④ 日本华人教授会议提供的报告为《关于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向福田总理的建议》,内容包括扩大和深化两国政府间交流、推进中日间FTA(自由贸易协定)和EPA(经济合作协定)、实施对华ODA(政府开发援助)的替代项目、促进研究和教育领域的共同事业、真正扩大民间交流等五个部分。《福田康夫访华行前接受日本华人教授会议建议报告》,《金融时报》2007年12月28日。

⑤ 《日本自民党邀请华人教授代表参加高层“学习会”》,中国新闻网,2008年4月29日。

tion for Science and Business ,1997) 以及海外青年华人论坛(1999)等,所有这些协会所涉及的内容均与中国有关,他们积极向美国和世界各国人们介绍和评价他们眼中的中国及其发展历程。<sup>①</sup>

#### 4. 解析中国问题,促进对相关领域的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华人学者在推介中国的过程中也在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多种思考和分析。美国华人经济学家陈志武<sup>②</sup>多年来连续发表文章,评价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如《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什么使三农问题恶化?》、《中国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中国经济前景为何离不开新闻自由?》、《中国跨国公司如何跨国?》、《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等等。发挥话语影响的华人学者不仅向住在国政府和人民传递信息、提供研判,而且也向中国政府部门和学界人士提供发展思路和第三方观点。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建设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他们通过观察发达国家经验,运用所学知识,积极为中国发展把脉。在这些华人学者中,既有中国大陆和台湾背景的经济学家、文化学者和政治学者,又有大量关心和愿意帮助中国发展的海外出生的第二或第三代华人学者。他们共同构成华人社会中值得重视的话语力量,反馈和促进中国相关领域方方面面的变革。进而言之,许多华人学者用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的思想观念和比较方法来观照中国,促进和丰富了中国政府和学界在政策、实践和理论探索方面的多重比较,直接影响而且改变了中国大陆以往封闭单一的思维方式和视野格局。

由于职业地位、与中华文化的血脉联系以及对中国发展的持久关注,华人学者往往能够在国际舆论界和学界的涉华议题中具有建设性的话语影响。世界关注中国,中国需要世界理解,需要提升自身的国际形象。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海外华人学者发出的话语不仅有助于展示理性中国、责任中国的形象,而且有益于中国与其他大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当然,并非所有华人学者的话语都被住在国和祖籍国政府所接受或认可,一些话语,在住在国看来,可能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冲突之嫌;一些话语,在祖籍国看来,可能有“唱衰中国”之嫌。但不管怎样,任何一个走向强大

---

<sup>①</sup> Xiao-huang Yin and Zhiyong Lan, "Why Do They Give?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 Philanthropy since the 1970s," This paper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Global Equity Initiative for a Workshop on Diaspora Philanthropy to China and India, held in May 2003.

<sup>②</sup> 陈志武,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被认为是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专业研究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获得过美国默顿·米勒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奖励。其著作常被《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远东经济评论》等国际著名媒体引用。

和自信的国度都具有兼容并蓄、兼听则明的胸怀。作为国际关系中一股令人瞩目的民间力量,海外华人学者会愈益为住在国和祖籍国双方的政府和民众所重视和关注。

### 三、华人学者在舆论界、学界涉华议题中的局限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政治权力斗争不仅围绕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传统硬实力资源展开,而且围绕价值观、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等软实力资源展开。从某种程度上说,国际政治日益变成“话语权政治”。<sup>①</sup>中国如何开展话语权政治,除了自身的软硬实力之外,无疑需要借助外部华人社会的民间力量,特别是华人学者的精英力量,共同促进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海外形象,并在此过程中注意和把握华人身份对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局限,协调好彼此关系的尺度,避免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不恰当比喻或联想。

#### 1. 华人话语权与中国话语权的关係

海外华人虽然可以在事关中国国家利益等重大问题上为中国呼吁、奔走,以赢得住在国政府和民众对中国的支持和理解。但王赓武对此曾不无忧虑地指出“当地华人不断增长的人数,特别是在北美,将使他们在帮助维持和扩大所在国与中国之间的合作范围中确保自己的既得利益。当然,承担这样的任务需要有对当地政治文化的敏感性,以及处理当代文化政治的技巧。如果处理不当,帮助中国的良好愿望可能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恶果,并且再一次地出现针对海外华人的猜疑和敌对气氛。”<sup>②</sup>另外,对华裔的种族敏感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华裔在院外游说活动的竞争中起步较晚。如果华裔美国人想要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话,他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sup>③</sup>有史以来,中国政府与海外华人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需要他们在重大涉华议题上的支持和认同,但这种支持和认同只能是在不违背华侨华人住在国法律和他们个人利益基础上的支持和配合。作为最大的亚洲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需要在加强自身软硬实力的同时,把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进步的洪流之中,与世界各国和谐共处,互利共赢,这才是中国未来话语权真正体现的根本。而中国国际话语权与华人学者精英话语权为互动关系,两者共生互补,相得益彰。

#### 2. 海外华人学者的主客认知困境

① 赵可金《中国发展需要国际话语权》,《人民日报》2010年12月9日。

② 王赓武《越洋寻求空间:中国的移民》,《华人研究国际学报》(创刊号)2009年6月,第46~47页。

③ 同上,第47页脚注。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大陆留美华人学者逐渐增多,这些华人学者所从事的研究大多是海外的“中国学”。他们在异域以西方眼光重新审视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以及作为个人所处于其间的茫然,并在学术层面上给予理解的同情和批判。这种“由移动而带来的身份意识的变迁”<sup>①</sup>构成海外华人学者职业生涯的主题。在此,“特别值得探讨的是,具有中国人身份的研究者所生产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与英语文献中的中国有何异同。大量中国赴欧美的留学生以研究中国作为专业,他们所研究的中国很难停留在一个客观外在对象的层次,他们经常性地利用寒暑假返乡研究、探亲并接受各级政府与各部门的咨询。平常他们加入中国海外教授的知识与联谊组织,对于国内的形势不仅关心,而且发表评论。这些活动与欧美的中国研究者在知识领域之外的生活实践,有十分不同的关注”。<sup>②</sup>进而言之,“中国身份的欧美中国研究者有两个对话对象,一个是他们在欧美的同事,一个是他们在国内的听众。华裔教授的尴尬处境,不是因为他们的中国身份引起的,而是因为他们吸收了欧美的中国知识,并站在欧美化的知识角度,来观察自己参与中国的生活实践。正因此,华裔研究者主客混淆的研究经历令他们自己感到不安”。<sup>③</sup>这是作为双重身份(或多重身份)的华人学者在跨国场域中必然面临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认知困境。

### 3. 华人学者不可避免的身份局限

在国际学界看来,华裔学者遍及各国“中国学”界的现象正在日趋普遍。同时,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和具有中国身份的研究者,此两者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也几乎是同步共进的。这个现象促成并将主导21世纪以来中国研究风气的转变,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华人学者在涉华议题中的话语权均将获得相应提升。事实上,关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舆论,在西方存在被固化的问题,而且很难被改变。故而,针对西方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依托各种力量,特别是具有独特话语背景和可能影响的信息传递者和表达者,“向世界说明中国”。在这方面,华人学者能够在适当条件下运用跨文化优势和话语影响,向住在国政府和人民阐述中国的历史现实和发展道路。当然,这种“推广中国”的促进活动,大多在住在国的学校和媒体层面比较易于展开。至于在住在国政府层面,华人学者的影响仍有限。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对政府的影响还很一般。美国政府或西方政府并不十分在意和注意

① 石之瑜《社会科学知识新论——文化研究立场十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② 石之瑜《中国知识的归类:脉络的并凑、累读与开展》,载石之瑜《社会科学知识新论——文化研究立场十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160页。

③ 同上,第160页。

华人学者声音。这并不一定是成见,这里有所谓的政治信任问题,对你的政治忠诚也有怀疑。另外,他们自己也有很强的政治研究力量。”<sup>①</sup>也就是说,华人学者在政治影响和文化交流方面仍有许多难以拓展的领域。这是难以避免的种族身份所决定的。

如今,中国与西方关系的主流不再是对立和对抗,而是相互依赖的加深,共同利益的增加,对话和合作成为基本潮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能够分享平等的话语权。也因此,政府和学界人士期待知道的是,华人移民在有关中国和平发展以及中国学研究和国际关系对话过程中有何作用?包括华人学者在内的华人移民群体是否像其他国际移民群体(如犹太人、印度人和亚美尼亚人)那样,在住在国和祖籍国的外交政策中发挥重要的话语影响力?<sup>②</sup>但事实可能是,现阶段的华人学者虽然已经在国际舆论界、学界涉华议题中享有并且能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但还有形成更重要影响力的巨大上升空间。华人学者固然在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具有其多重认同和复合身份的困惑和迷茫,但也正是凭借其多重认同和复合身份的优势,他们才能够更自觉地把职业身份与人类利益熔于一炉,从而为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为国际关系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族裔知识精英群体的积极贡献。

#### 四、结 语

“海外人口与外交政策研究,理应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次领域”,“海外人士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取决于海外人士穿透政策过程的能力以及(反过来)国家左右这些海外人士的能力”。<sup>③</sup>作为华裔人口中的精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华人学者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凭借自身的学术地位和影响,致力于提升中国形象以及改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这种努力最终将同时有助于住在国对华政策的改善和祖籍国对外政策的改善。可以肯定的是,移民人口对于住在国和祖籍国外交政策和舆论影响是一个双向的交互过程。21世纪以来,随着海外华人社会中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高端人才的增多,他们对于住在国和祖籍国关系的互动已经有目共睹。与之相应,住在国和祖籍国政府也正在逐渐加强对于这些海外人才资源的调用,以服务于自身的国家利益。

① 王文《美学者:中美需要公正的评论者》,《环球时报》2007年12月10日。

② 刘宏《海外华人与崛起的中国:历史性、国家与国际关系》,《开放时代》2010年第8期。

③ 江忆恩《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理论趋势及方法辨析》,http://www.aisixiang.com/data/14305.html,2007年5月14日。

learning , mutual benefit and win – win” ,therefore ,they are not only an inheritance of the spirit of the Silk Road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but also an advocacy for and an innovation of the Bandung Spirit of unity ,friendship , and cooperation along with the notion of “four insistences” for moving to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Keywords:** Bandung Conference , China , Diplomacy in Asia and Africa , Bandung Spirit ,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About the Authors:** Yu Jianhua is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Vice President of Shanghai Society of World History.

**Yu Jianhua**

## 59 Overseas Chinese Scholars and the Shaping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Voice

**Abstract:** The topic of having a say and an international voice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since the 21st century. Along with the ris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nternational image ,the judgment of the outside world as to China is not one – sided: it is neither exalting nor denouncing; rather ,it is a reaction mixed with praise , approval , doubt , resentment , fear , slandering and even attempting to kill with flattery. How China to explain her own development path and mode to the world in this process not only requires the wisdom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her ow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but also needs a large number of the academics who are residing overseas with th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local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are willing to elucidate the China in their minds , as well as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China’s development ,to the worl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tting a sa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tents of discourse ,the effect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scholars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as to the China – related topics in the circle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nd academia.

**Keywords:** domai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Chinese Scholars , influence of voice

**About the Authors:** Wu Qianjin is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u Qianjin**